

有关高等教育哲学的几个问题

张 楚 廷^①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高等教育哲学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以出现?大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如何关联?大学校长的自觉首先表现为他对“大学是什么”的深层思考。对于自身独立且自觉的思考,是中国大学所必然要经历的。唯有如此,大学才自觉其为大学。所谓一流大学,必是有更高哲学自觉的大学。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哲学; 校长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2)01-0001-04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re're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higher education, such as, what is university? how did the university emerge? how to relate the destiny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at of mankind? First of all,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ident of a university is manifested on the profound consideration over What is a university. The self-conscious consideration on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university is undoubtedly to be experienced. Only by this way, can a university become the university. Surely,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is the university with a great philosophy-consciou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philosophy; president

在任何一项活动中,人们总是一边做着,一边思考着的;在思考之中,又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从而总有可能由形而下走向形而上。这就到了哲学。

在思考着的人群中,总会有些人更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总会有一些人显示出智慧,甚至有些人刻意地追求智慧。而哲学正是智慧之学,这样,人们就有意无意地追求着哲学。

所以,我们就高等教育哲学的某些问题进行一

些讨论,也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些什么

一般来说,哲学研究一些本原的问题。

例如,关于人的学问有许许多多,关于人的生理学、心理学,林林总总。然而,关于人的哲学,它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向哪里走去?这也就是关于人的一些本原的问题。

^① 收稿日期:2011-09-23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关于教育,相关的哲学专称为教育哲学,它最为关心的也是一些本原的问题。例如,教育是什么?什么是教育?人何以能教?教育从何而来?教育何以发生?教育与人类命运有何关联?

因此,高等教育哲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就很好理解了。诸如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以出现,大学何以最早产生在欧洲,大学与时代的变迁怎样关联着,大学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如何,人的命运与大学的命运有什么联系,等等。

关于“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常常又延伸为另一些问题,比如,大学的理念是什么?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大学的文化是什么?甚至还进一步询问:知识是什么?大学在知识问题上有何独特的价值观?大学在真理和功利的关系上持什么态度?通过由“大学是什么”延伸出来的问题的探讨又反过去回答“大学是什么”这样本原的问题。

社会中,从事学术活动的机构并不少,大学从什么特定的视角去看待学术?学术对于大学有何特别?大学的学术有何特别?大学最崇尚的是什么?大学最珍惜的是什么?大学最应拒绝的是什么?

自由是无价之宝,自由为何对大学尤其珍贵?谁不需要自由?为何大学尤其需要自由?谁不希望自治?为何大学尤其需要自治?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对大学有何特殊意义?

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大学的社会责任是相互作用的吗?大学的社会责任由谁来确定?大学在道德与法律面前处在何种地位?大学所应享有和它所应承担的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吗?

这样看来,由一些本原的问题延伸开来所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同时,即使延伸开来的问题,也依然是在形而上意义下的思考,高等教育哲学还是与高等教育学讨论的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哲学的论题既是丰富的,又有一定的临界点。

另一方面,当高等教育学的内容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充实的时候,高等教育哲学活动的天地也会更宽阔,它的立足之地也会更厚实。不过,高等教育哲学并不是那样及时、那样自然地尾随着高等教育学而来的。

二、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意义何在

大学校长们,哪一位不在工作着,忙碌着,哪一

位不是有做不完的事情?然而,校长当得好的,被认为优秀的校长,又有哪一位不是对“大学是什么”有过特别的思考、有过独到的看法的呢?

有条不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校长随处可见,然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目标远大、理念先进的校长却不多见,能够自觉其工作,卓有成效、独辟蹊径开创性工作的校长并不常见。

校长与其副手,与其团队的其他成员相比,并不一定在于他理事更多,过问更细,事必躬亲,而在于他能站得更高,看得更明,想得更远,见解更深。

有什么能帮助校长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呢?那就是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

要求每位校长都在哲学或高等教育哲学领域有所建树,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求校长们都有一些哲学思维的习惯,都有一定的哲学修养,都能研习既有的一些高等教育哲学论著则不为过。

哲学确是智慧之学,“汉语‘哲’字亦为智慧”,“‘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 *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1]高等教育哲学正是高等教育的智慧之学,校长能不跟它打交道吗?哲学是机敏的、睿智的、深刻的。出色的校长事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与哲学结缘。越是自觉越好,自觉的哲学思维与自觉的大学治理密不可分。

校长总应当是特别善于思考的吧?哲学就是帮助人们善于思考的,同时,善于思考的人就是在靠近哲学,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于一所大学的整体哲学水平,是这所大学的整体办学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所大学的整体哲学水平较高,意味着师生普遍更聪明一些,管理人员普遍更精明一些。大学校长自觉的哲学修养,就应表现在比较自觉地关注整个学校的哲学水平上。

从19世纪到20世纪,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是德国和美国,同时,哲学最为繁荣的国家也是德国和美国。两者的高度一致说明了什么呢?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都有最为繁荣的哲学研究。在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拥有中国最优秀的哲学教授。这两者之间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上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大学特别令人怀念,有学者称那是“过去的大学”。实际上,那时不只有优秀的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而且有最优秀的哲学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胡适、梁漱溟。这也说明了同样的一致性。

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中国上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的落后与哲学的落后也是相伴而行的。虽然现象是如此不同而所说明的道理又是如此相同,这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前面所提到的一致性。

从事教育的,最好懂得一点教育哲学;从事高等教育的,最好懂得一些高等教育哲学,做一个自觉的、清醒的、睿智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这是历史和逻辑同时告诉我们的结论。

三、高等教育哲学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轨迹

说到高等教育哲学,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著作可能就是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这本书自1987年中译本出版以来至少重印了四次,在中国的发行量不小。

布鲁贝克的这本书初版于1978年,“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2]。然而,这本书并不是西方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雅斯贝尔斯有一本著作,名为《大学之理念》,从其探讨的基本问题看,堪称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此书出自何时呢?有一文献注明它出现在1923年。^[3]然而,此书英译本的编者在前言中说“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写于希特勒专政的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4],那就是1945年前后了。按前一说法,这一高等教育哲学著作较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早了半个世纪;按后一说法,也早了30多年。

纽曼的一部著作名为《大学的理想》,按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名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即知这两部著作同名。那么,纽曼的书是否也为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呢?

一般认为,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而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是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为什么这两部同名著作具有不同的性质呢?这是尚需加以说明的。

虽然纽曼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大学是什么的问题,但他的侧重点在阐述大学的任务、使命和目的,在知识的传播上。他说:“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播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扩增知识为目的。”^[5]他的《大学的理想》则以基本的篇幅来论述大学主要承担传播高深知识的使命,主要应是传播普遍知识即自由知识的,因而他也是主张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他甚至不认为大学有扩增知识从而有从事研究的使命,这显然是对洪堡思想的一种倒退。故

而,从总体上看,他并不是用哲学的眼光在全面地审视大学,从而不能说《大学的理想》是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雅斯贝尔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即使他的《大学之理念》、《什么是教育》,讨论的虽然是教育,却也堪称哲学著作,只不过可以专称为教育哲学著作而已。雅斯贝尔斯把大学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制度、一种超民族的机构来全方位地探讨大学,来回答大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充满了哲学的意蕴。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是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的教育学著作,出现在1632年。逯逊克兰兹的《教育学体系》一书被认为是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写于1848年。从第一部教育学著作到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其间相隔了216年。

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被认为是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出现在1852年。如果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被认为是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并确认出现在1923年,那么,其间相隔了71年,若确认在1945年前后,则相隔近百年了。

有两个事实可引起一些思考。一是从一般理论发展到较为全面的哲学论述,无论是216年还是71年或近百年,都表明这个过程并不是那样容易迅速到来的。

第二个事实是,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的作者逯逊克兰兹是德国人;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的作者雅斯贝尔斯也是德国人。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的开创性工作都首先出现在德国,而不是随便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可以出现的。

常听人说德国的秘密武器是其发达的职业教育。其实,这算不上什么秘密,真正有点秘密却也并无多少秘密可言的,是德国发达的哲学,这恰是相对较少被注意的事实。然而,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有更深远影响的事实。

又正好是美国人更清晰地看到了德国的秘密并努力向德国学习。德国的繁荣背后有其高度发展的科学,与此同时,是高度发展的哲学。在我们看待美国时,可能正需要像当年美国看待德国那样,不只是看到美国发达的经济,同时要看到美国发达的科学和哲学。也常有人说,美国不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吗?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呢?并且,若论实用,德国的哲学不也事实上表明了它是多么实用的吗?这种实用的全方位巨大影响远非都被人们充分理解了。

四、我们的实然现状和应然走向

提到中国的教育学,古代的《学记》是一个特例,近代以来的教育学则基本上出现在欧洲,中国“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一科则在20世纪初”。^[6]

说到高等教育学,比较正式的著作并同时开始高等教育专业的教育,这应当以厦门大学和潘懋元先生的工作为标志,始于1984年。在拨乱反正的1978年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这样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这已大大晚于西方高等教育学出现的1852年了。另一方面,在1984年之后的不太长的时间里,大约20年之后,中国也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

中国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孔孟时代即有自觉的教育活动,但系统的教育学最早并不产生在中国。教育哲学在中国的出现则是更晚的事了。

中国的大学有百多年的历史,但中国系统的高等教育学却是近期才出现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也就不可能更早出现。

这个历史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理论兴趣、哲学兴趣的微弱。这种微弱,也许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比如说,中国古代,有发明,却较少发现;有技术,却较少原理性研究;有形而下,却较少形而上思索。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和那个时代就已出现的基于思辨的公理化思想,在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难以在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的传统中,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从实际出发;西方的传统中,看重从概念出发,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结果是,逻辑学在西方产生,理论伴随着甚至引领着他们的产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

感性和理性在认识活动中,在科学活动中,都是重要的。但是,崇尚感性与崇尚理性带来了巨大的差距。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会牵涉到历史和社会的方面。我们就不在此进一步展开论述了。

事实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实用主义哲学。一种是强调对人自身发展的实用,或称之为内在实用;一种是强调对人自身以外的实用,如对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有用之类,可称之为外在实用。内在与外在并不是没有联系的,然而,内在实用可能自然延拓至外在实用,而外在实用在出发点上就不易自觉回归到内在实用上来。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我们似乎是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说明我们走向高等教育哲学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并不是很容易在刚刚兴起的理论兴趣基础上生长起

哲学兴趣来的。中国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上走在前面的几所大学,早已有了高等教育学的兴趣,却并不见有多少高等教育学深层的理论兴趣和哲学兴趣,这一事实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否有关呢?

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所共同表明的法则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科学、哲学和经济的繁荣是它们携手共进一起带来的,三者缺一不可。而它们一起携手前进的社会或历史条件便是开放和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于学术之中。今日之中国,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中国,业已让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赞颂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978年之后,中国也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

文艺复兴和德国、美国的经历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科学、工程技术的繁荣是离不开哲学繁荣的。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要走向全面复兴,如果要兴旺发达,是不可能缺少高水平的哲学的。

由此,我们更可明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的繁荣,是离不开高等教育哲学的繁荣发展的。要想高等教育持续繁荣,是不可能缺少高等教育哲学的持续繁荣的。

历史告诉我们,实践兴趣几乎是无须提醒的,然而,理论兴趣、哲学兴趣是需要呼唤的。也许,专门从事哲学、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是相对的极少数。但是,具有哲学兴趣的人则应当是绝大多数。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具有高等教育哲学自觉的人更应是大多数。我们盼望这个大多数的出现,就是在盼望中国高等教育繁花似锦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冯契. 哲学大辞典[K].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337.
- [2]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译者前言.
- [3] 张汝伦.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25.
- [4]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 [5]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
- [6]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K].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95.

(本文责任编辑 曾 伟)